

本书荣获

西藏历史地位辨

王贵 喜饶尼玛 唐家卫 著

民族出版社



本书荣获

- ◆ 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 ◆ 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特等奖



王贵 喜饶尼玛 唐家卫 著

民族出版社

西藏历史地位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历史地位辨/王贵,喜饶尼马,唐家卫著. —修订本.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ISBN 7-105-05410-7

I. 西… II. ①王…②喜…③唐… III. ①西藏问题—研究
②政治制度—历史—西藏③地方史—西藏
IV. ①D677.5②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87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3.875 字数:593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4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再版说明

《西藏历史地位辨》这部学术著作出版于1995年,1997年第二次印刷后,仍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特再版此书。

此书征引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有理有据,全面、系统地批判了“西藏独立”论,从而得到相关地区、部门,特别是藏学界的重视和好评。原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人阴法唐认为该书“在构思和立论方面,在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文字的生动性、战斗性,论述的透彻性、求实性等方面,都有一些独到之处,给人以政治敏锐、思想性好、说服力强的突出感觉”,“是迄今我们批驳‘西藏独立’谬论的代表作”。中国炎黄研究会副会长姜思毅说该书“是一本全面、准确地阐述西藏历史地位,系统地批判‘西藏独立’论,有力地发扬爱国主义的学术论著”,“书中,洋溢着作者对伟大的多民族祖国的热爱,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西藏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我国内政,挑拨离间和西藏分裂主义者一系列罪恶行径的极大义愤”,“具有颇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的理论价值”。《人民日报》说“这是全面系统地驳斥‘西藏独立’谬说,阐述有关问题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论著。”《光明日报》说此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藏学研究的一项可贵成果。”

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1996年,此书缩编成适合国内外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由五洲传播出版社于1997年以汉、英两种文字

出版,作为重点书目向国外发行。当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带去该书英译本,赠送克林顿总统等。

为满足藏族读者的需要,此书还于 2001 年出版了藏文本。

这次再版,全部书文依旧,只是对个别地方作了小的文字修改。

民族出版社

序 言

1980年我在西藏工作时，看到了夏格巴·汪秋德丹所著《藏区政治史》的汉文译本。翻阅之余，深深感到该书完全混淆颠倒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全面歪曲捏造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极力诋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的和平谈判和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盘否定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正确领导以及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对解放西藏和西藏革命、建设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肆意诬蔑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和各界爱国人士选择的政治道路，声嘶力竭地鼓吹“西藏独立”，堪称“西藏独立”论的代表作。

夏格巴的这本书，以“维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所以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但它一遇到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和熟悉情况的人，便立即遭到强烈义愤的谴责。当时筹备建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噶雪·曲结尼玛说，要把夏格巴的这本书当成箭靶子，我们都来射。随后，自治区政协正式提出组织批判，并由拉敏·索朗伦珠副主席和噶雪·曲结尼玛向我谈了这件事。接着，我的这两位朋友就和另外几位朋友吉普·平措次登、恰白·次旦平措、崔科·顿珠次仁、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朗顿·贡噶旺秋、拉鲁·才旺多吉等政协领导人和藏学专家、学者等，有组织地阅览夏格巴的书，准备材料，研究撰写，由噶雪·曲结尼玛、崔科·顿珠次仁、吉普·平措次登三位牵头，恰白·次旦平措执笔。在研究中，宋子元同志也曾到会鼓励支

持。但是，当时藏学这一重要社会学科，在我国还没有正式立项，有关机构设置、力量组织、资料集中等问题，都还处于筹研之中；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所以对夏格巴这本书的批判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只是在少数单位和人员中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已经开始的撰写也未能继续下去。然而不久，恰白·次旦平措主编了《西藏简明通史》一书，于1991年出版，其中有多处对夏格巴书中的谬说就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四川、西藏各地的我国藏学研究机构先后正式建立并开展工作。他们在深入研究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持续批驳“西藏独立”思潮的同时，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邀请和会同学者、专家以及各方面人员，以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夏格巴一书进行了批判，见诸书刊的有关文章、讲话日渐增多，在国内逐渐形成了相当广泛的驳斥声浪。这是很可喜的。

1990年，我在北京又看到荷兰人范普拉赫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此书的基调来自夏格巴，但增添了国际法和民族自决权等内容，企图论证旧西藏具有“独立国家”地位。它一流入中国，就同夏格巴的书一样，立即陷入我国藏学、社会科学界的驳斥声浪中。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的两本书，集“西藏独立”说之大成，其中的具体论点，涉及西藏从古到今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达赖集团外逃以及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反应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庞杂。研究和批判这两本书，肃清其影响的任务，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这次由四川藏学研究所确定课题，由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三位同志执笔撰写的《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充分的论据，犀利的笔锋，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两书中的各种主要论点，作了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剖析和驳正，比较彻底地剥下了夏格巴、范普拉赫“维护”西藏民族利益和所谓人权的欺世伪装，使人们看清了他们最严重地损害西藏民

族利益和践踏西藏人权的真面目，澄清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这本书图文并茂，有些史料是首次披露或公开使用，不少内容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与许多西藏朋友及同志们从 1980 年前后就产生的系统、全面、彻底批判“藏独”思潮的愿望，并在一些地方受到启示。作为一个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我对此书的出版感到庆幸。这是一本抵制西藏分裂主义思潮，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回答国内外舆论界有关西藏问题种种疑问的好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值得西藏地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同志和全国各地、各部门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同志们一读。

反对“西藏独立”思潮的斗争，是西藏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全国各地思想政治战线方面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已经走上独立自由、繁荣昌盛、民族平等团结、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自然绝对不会容许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之流所妄想的旧历史重演，社会倒退，祖国领土被分割，兄弟民族间隔阂冲突再起，使劳动人民仍像在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时代那样被剥削压迫，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外藏学界和国际公正舆论中否定“西藏独立”一说，同情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书著、文章正不断出现。我们坚信，在四川藏学研究所的这本书问世之后，批判夏格巴、范普拉赫两书的好书、好文章还会不断涌现，声讨“西藏独立”的热浪必将更加高涨，西藏地方和各省藏区及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力量必获全胜，分裂主义势力必定彻底败北。

阴法唐

1995 年 3 月于北京

前 言

一团小小的迷雾，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 19 世纪末叶统治的南亚次大陆升腾，到中国西南部的边疆高原地带凝成，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了，它就是“西藏独立”。这团飘忽不定的迷雾，时浓时淡，时聚时散，虽然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气候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影响。它往往遮障了国内外某些善良人士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历史的真正面目，难以对事物的性质作出正确判断。

人们只要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就能发现引人深思的事实，即：“西藏独立”一词的发明权和“西藏独立”一曲的领唱权，并不属于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藏、汉等族中国人，而是属于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英、美等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 (Curzon)，以及英国驻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 (Mc Mahon)、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 (Bell) 等人，撇开、越过中国的清王朝、民国政府，直接逼迫、诱使西藏上层统治者同意英国人在西藏开设商埠，割占土地，获取种种殖民主义特权，以达其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领土上割裂西藏的目的，因而首先道出了“西藏独立”一词；这时，接受过英国人丰厚馈赠的西藏大贵族擦绒·达桑占堆 (ཇའ་རྩོད་ཐུག་བཟང་དགའ་འདུལ་)、司伦夏扎·班觉多吉 (བཀའ་པོ་ལྷ་པོ་འཕྱུར་མཆོད་) 等人就跟着唱起了“藏独”的调子。本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50 年代初期，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震撼了全国和世界东方之时，为了保护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者多年侵略西藏取得的巨大权益，阻挡西藏的解放和中国的统一，英国、印度驻拉萨“办事处主任”黎吉生 (Richardson 又译理查逊) 等再次大谈“西藏独立”；亲英的西藏摄政活佛大扎·阿旺松绕 (ལྷ་པོ་བཟང་ལྷ་པོ་འཕྱུར་མཆོད་)、大

贵族司曹鲁康娃·次旺绕登(ལྷ་ཁང་ཚེ་དབང་རབ་བཟན)、噶伦索康·旺钦格来(བླ་ཁང་དབང་ཚེན་དགེ་ལེགས)、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ཞུ་མཁའ་དབང་ཕྱག་བདེ་ལྷན)等人也跟着大唱“藏独”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充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的荷兰人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和美国国会中的一些参议员等,为了给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制造麻烦,以阻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步伐,干扰西藏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又一次大谈“西藏独立”论;流亡国外的藏人中,获得某些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给予重金或其他好处的“西藏青年大会党”成员洛桑京巴(ལོ་བཟང་ཕྱེད་པ་)、詹东·丹增格切(བཟུང་མཐོང་བཟླ་འཛིན་དགེ་བྱེད)以及甲日·白玛杰布(ཏཱ་ལའི་པད་མ་བཟུལ་པ་)等人也就再一次大唱起“藏独”曲。可见,这个“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强权政治紧紧伴随、密不可分;而跟随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者谈论“西藏独立”的西藏分裂主义者,大体都是一些依附于洋人而且并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的人。这正是“言独立者,实不独立”。

当然,现代“西藏独立”的迷雾,并非以黎吉生、范普拉赫等先生为源头,而是有着更深更大的背景。它是西方某些大国中的政治势力对华总政略和既定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政略和方针的制定,是十分秘密进行的,至今也难以了解其全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作了这种事,总会走漏一点消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走漏得还会越来越多。60年代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的海尔营地(Camp Hale)极其秘密地训练了几批准备向西藏空投充当叛乱武装骨干的藏族特工人员。美国的政治教官在授课时就对藏族受训人员说:“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就会更大。要趁他还穷的时候,设法将他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

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到这里来受训的”。^①参加过这一训练,直接聆听了美国教官此番讲话的藏人,后来在与祖国较量、吃尽苦头、发现毫无前途的情况下,终于回国定居,向我们讲述了上述实情。这说明“西藏独立”迷雾的背后,确实早已插着外国粗大的手。加拿大的戈伦夫所著《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说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训练西藏叛乱武装一事^②,证实了这只粗手的存在。达赖喇嘛本人近年也公开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支持西藏的叛乱武装。^③其它一些书籍、资料中也不断披露某些国家里,确有少数机构、团体、政要在暗中怂恿、策动、资助“西藏独立”活动。这是“西藏独立”论得以时常挤进世界政治讲坛的根本原因,也是迷雾的源头。

几十年来,国外陆续出版了一批公开论说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书籍、刊物、文章,如英国人黎吉生所著《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法国人巴考所著《西藏史引论》(Introduction: L'histoire du Tibet),以及西藏分裂主义者在国外印制的许多报纸、宣传材料等等。然而对“西藏独立”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叙述,并试图为此找些理论根据的书,当推夏格巴·汪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བདེ་ཁྱི་ཁྱིང་རྒྱལ་རྒྱལ་རྒྱལ)和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的地位》(The Status of Tibet)两本。其中,《藏区政治史》先后有过两个版本,第一个是英文版本,系1963年以后夏格巴在美国耶鲁大学撰写,于1967年出版;第二个是藏文版本,由夏格巴修改增补后,于

① 从印度回国定居的藏胞丹巴(བདེ་ཁྱི་ཁྱིང་རྒྱལ)1991年5月27日对西藏自治区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人员的谈话记录。

② [加]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30—232页,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③ 1993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杂志》周刊报道记者迪娅·德雷菲斯对达赖的采访谈话。

1976年在印度出版。《西藏的地位》由范普拉赫先生写出后，于1987年出版英文本。这两本书，是“西藏独立”迷雾的两个最浓点，在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达赖集团对之大力宣扬，将这两本书说成是“权威著作”、“维护藏民利益的经典著作”等等。近一、二十年，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鼓噪“西藏独立”的主要理论依据，均来自这两本书。

一团小小的迷雾，当然遮不住太阳普照大地的光芒。“西藏独立”论，过去没能今后也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和西藏社会历史性的飞跃。但是，它确实又曾给中国、特别是藏族地区的革命建设事业带来了一些麻烦，也曾给中国的对外工作和国际交往活动造成了某种困难。所以，为了对内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以达到祖国多民族的共同繁荣，对外消除一些国外人士的疑惑、误解，进一步发展同各国人民、友好人士的交往，促进世界和平事业，我们对于“西藏独立”论，重点是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上述两本书，从史实上和论据上作一番系统的彻底剖析，以期与国内外人士，首先是对西藏问题有兴趣的国内外学者们共同开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为了给“西藏独立”论制造根据，必须改变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因而不能不依靠虚构度日。他们的“西藏独立”论，完全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的。“不说山大的谎，哪来牛大的理”（ཉམ་པ་རི་ཙམ་མ་བཤད་ན། བདེན་པ་གཡག་ཙམ་མི་ཐོབ།），这一藏族人人皆知的著名谚语，似乎正是对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的地位》以及西藏分裂主义者的其他许多书刊、文章的写照。例如，范普拉赫先生说“西藏一直是完全独立并与中国相分离的”，说1951年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西藏代表团“加盖的印章，据说是中国当局在北京伪造的西藏政府图章的仿制品”，等等。像这一类虚构的语言，实在太多，要将其全部列出，是相当费

事、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对其中主要的段落、语句以及各种结论,却有必要逐一列出,并加以澄清和评说。

“不说山大的谎,哪来牛大的理”,同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假话说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名言一样,都是希图依靠虚构取得成功者的唯心主义信条。诚然,虚构者得好处、有理者反吃亏的现象,在群众文化程度很低、社会制度落后、真假善恶难分的旧时代中,倒是常常可见,但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理者仍将受到人们的推崇,说谎者必会遭到世人的唾弃。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各国人民政治、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明辨是非能力大大增强,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今天,再想靠虚构来取得成功,就越发困难了。而握有真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是会将那些唯心主义者如何进行历史的政治的虚构,彻底讲个明白,还事物以本来的真实面目,从中赢得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信任,使虚构者失去舆论阵地。这种情况,在当今的世界上正越来越多起来。因此,人类大体已经逐步进入“虽然说了山大的谎,也得不到牛大的理”(དམ་པ་དེ་ཙམ་བཤད་ན་ཡང་། བདེན་པ་གཡག་ཙམ་ཐོབ་ཐབས་མེད)的新时代。可以预言,关于“西藏独立”的虚构,必将被全世界人民完全识破而被彻底抛弃。从50年代以来,各国政要先后发出关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声明中,已经可以看清这一朕兆。但是,这并未肃清历史虚构者们继续散播的影响。

“西藏独立”的梦幻曲,早就引起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关注,众多的干部、群众,特别是藏学研究工作者,早已纷纷投入对“藏独”论的批判中。1988年,有威望的著名藏族爱国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ང་ཕྱད་ངག་དབང་འཕྱགས་མེད)就正确指出:“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些鼓吹‘西藏独立’的人无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书为依据。我反复详细地研究过这本书,认为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时,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这样得出

的结论只能是谎言,谎言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①然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却反驳阿沛副委员长说:“即或权威学者夏格巴有‘断章取义、取其所需’之处,也是为六百万藏人的事业而取义取需,断违背六百万藏人利益及歪曲史实的谎言之章,这正是他的崇高业绩与无尚光荣。”^②这一反驳是可笑的。他们在这里承认了夏格巴的断章取义、取其所需之行为。“断章取义”是在引用历史资料中故意掩盖真实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藏独”分子却把这种行为当成“崇高业绩与无尚光荣”,这完全显露出他们理论的贫乏和语文水平的低下。难道靠断章取义来著书的夏格巴这类“权威人士”能给藏族人民带来利益、谋取幸福吗?恰恰相反,恐怕只能带来危害吧!?

西藏问题,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敏感的民族、社会问题之一。关于西藏问题的是非,究竟如何鉴别,当今国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不同的分析方法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1950年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我们说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解放和统一的神圣事业,但有人则说是“中国军队侵略西藏”。又如1959年以后,西藏旧社会制度消亡,我们说是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伟大民主改革,但有人则说是“摧残了西藏人权”。

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论坛上,几乎随处可见。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客观事物却只有一个是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因此决定了其观点是真正客观公正的观点。人们观察西藏问题,只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

① 阿沛·阿旺晋美(ངཤལ་པག་དབང་འཕགས་མེད):《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事件”的真相》,载于《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3—5页。

② 强巴丹增(བླ་མ་པཎ་ཅན་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པ་):《阿沛·阿旺晋美为何要在1959年事件上再次造谣?》载于1988年11月《知识》(ཤེས་བྱ)月刊。

带偏见,就能分清是非、善恶,穿透和驱散“西藏独立”这团迷雾,使支持“西藏独立”者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曝光,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也就可以看清楚了。

由于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两本书,对于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史进行了全面歪曲和篡改,对于和平解放以后的西藏革命成就及社会的伟大进步加以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这样,就使他们的书著内容涉及到古代和现代历史、社会学科的广阔领域,并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我们对他们的“西藏独立”论进行剖析时,也就不能不跟着他们进入上述广阔的领域中。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撰写他那不朽著作《反杜林论》时的心情。恩格斯称杜林的思想体系为“一个酸果”,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恩格斯说他“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头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① 恩格斯还说他“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② 今天,我们非常需要学习恩格斯的“啃酸果”精神,跟踪夏格巴、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独立”论的一切内容,进入他们那广阔的领域,去详尽地评说“藏独”论的各种主要谬误及歪曲论断。

“西藏独立”论的宣扬者,除了使用掩盖、歪曲历史等手法外,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就是混淆词语,偷换上述名词的概念。例如,遇到西藏归属中国的问题时,他们经常在“西藏”(藏文 བོད་ཡུལ་, 英文 Tibet)、“藏人”(藏文 བོད་པ་, 英文 Tibetan)、“中国”(藏文 ཡུལ་ཁྱོད་, 英文 China)、“汉地”(藏文 ཡུལ་ཁྱོད་, 英文 China)、“汉人”(藏文 ཡུལ་ཁྱོ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6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② 同上书,第 47 页。

英文 Chinese 或 Hans)、“中国人”(藏文 གུང་གློ་མི།, 英文 Chinese)等名词上制造混乱,偷换上述名词的概念。又如,说到侵略、吞并等行为时,他们不针对真正实行这种强权政治、欺压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反而针对坚决反帝、彻底为人民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偷换“侵略”、“吞并”等动词的概念。这也是一切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难以站住脚的论著者自知理亏时的常用手法。所以,我们在剖析“西藏独立”论中,还不得不进行一些词源方面的探索,将这些词语的概念彻底搞清楚,使人们看清“西藏独立”论者是如何借此迷惑世人的。

经过我国史学界、藏学界许多仁人志士的辛勤努力,几十年来,专门系统、全面叙述中国历史、藏族历史、祖国和西藏关系史的专著、史料选辑集等,在我国已经出版多部。因此,本书不以叙事为主,而以评论为主,只是在评论中,带出一些必须叙述的重要史实,但不进行全面、系统地叙史。

本书中的主要人名、地名、职位名等专有名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时,大体均在汉文后面括注藏文或英文,以便读者阅读时,能够当即明了此一专有名词的藏、汉、英等文字的写法。

由于此书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本书中的论述难免有不够周到、妥当之处。我们非常盼望各地同志、各方人士赐教指正。

封面书名题写人：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

作者简介

王贵，汉族，原十八军进藏干部，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

喜饶尼玛，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副校长。

唐家卫，汉族，原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四川藏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曾经长期在藏区工作。